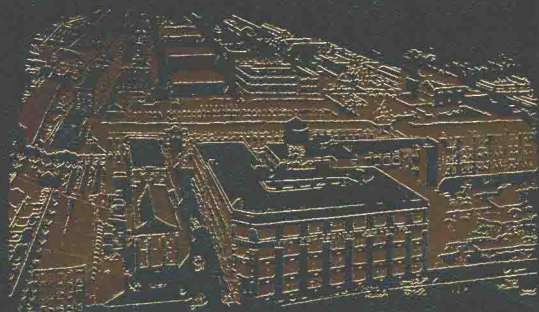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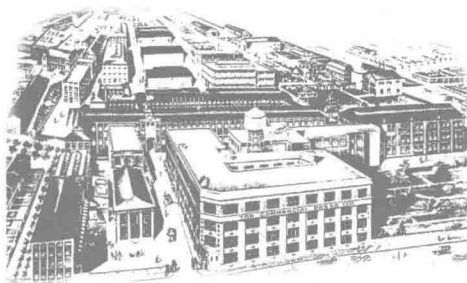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
“现代”转型
(1902 — 1932)

董尚敏 等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 “现代”转型 (1902 — 1932)

董丽敏 等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
董丽敏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 - 7 - 100 - 13994 - 6

I. ①商… II. ①董… III. ①商务印书馆—历史—研究—1902—1932 ②文化史—研究—中国—1902—1932 IV. ①G239.22 ②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388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1902—1932)

董丽敏 等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994 - 6

2017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8 3/4

定价:69.00 元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1902—1932）”的最终成果。

序 言

熊月之

书籍作为出版机构的产品，兼有一般商品与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效益，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责任。出版机构办得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于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亦即义利关系处理得当与否。约略说来，结果无非以下三种类型，或曰三种境界：一曰得利失义，以盗版拼凑、低级趣味为利藪，旋起旋灭的书商多属此类；二曰得义失利，有外部资金注入、党派或官府所办、只谋其义、不计其利的出版机构属于此类者为数不少；三曰义利兼得。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每一类型之中，义利比重又可分为多种层次。那些历史悠久、饮誉遐迩的出版机构，多属第三种境界。近代七大书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与文通书局，无一不属此类。长踞榜首的商务则是其中的楷模。其经营理念的两句话，“在商言商”与“文化本位”，典型地反映了义利兼顾的宗旨。

义利兼顾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义利分途，以利辅义，即出版人常说的以书养书，两类书都出：一类以经济效益为主，赚钱，但文化上没有多少贡献；一类以社会效益为主，得名，但不获利或获利甚微。出版社统筹兼顾，经济上通过前者弥补后者，起助推作用；声誉上通过后者滋养前者，起带动作用。第二种是义利合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为一体，一部书既赚钱又得名。不消说，第二种模式最为理想，也最为高超。商务印书馆

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多时候能够做到义利合一。

商务初创时的业务，主要是为商家印刷票据广告，翻印《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之类英语教材，以及适应科举考试的字典、书籍，诸如《康熙字典》《通鉴辑览》与《纲鉴易知录》等，志在谋利，这也是其他出版机构能够做或正在做的事情，文化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贡献。商务进入义利合一境界，始于张元济的加盟。编写新式教科书，为教育改革打基础；出版严复等人所译西书，为文化启蒙添新知，这些都是时代所呼唤、社会所急需的文化产品。1906年清廷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102种，由民营书局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版就占54种。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在教科书编印方面，商务一度有些迟钝，让中华着一先鞭，但很快缓过神来，奋起直追，终于重坐头把交椅。到1924年，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上，商务占十之六七，中华占十之二三。民国时期，商务编辑出版的以《辞源》为代表的大型汉语词典，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以《万有文库》为代表的大批知识读物，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为代表的众多刊物，在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西方文化的引进与普及、国民素质的培育与提升方面，都有重要价值，都是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产品。这些项目的实施，为商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商务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1947年，胡适推荐张元济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就特别提到他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他主持的《四部丛刊》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使一般史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①

义利合一，名利双收，出版机构谁不想臻此境界？但真正能够做到的

① 转引自张人凤、柳和城编：《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8页。

总是凤毛麟角。考其原因，在于要达此境，必要条件至少有三：一是出版人必须具备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时代意识；二是企业实行科学管理，从组稿编稿、印刷发行到成本核算，每一环节都优质高效；三是具有世界一流、超越同行的印刷设备。这三条，人才、制度、设备，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商务都具备了。这三条，也是学界论述商务印书馆成功之道时常提及的。这里需要略加申述的是第一条中“敏锐的时代意识”问题。

众所周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济效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责任。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教育体系、政治制度、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持久、深刻的变化。从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从以农立国、社会流动量少而缓慢，到振兴工商、社会流动逐步加大加速，从科举考试到新式学堂、出国留学、职业教育，从诗云子曰到声光化电，新知识、新事物、新职业，层出不穷。一句话，社会发生了全面的转型。是否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转型，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出版内容、样式、重点具有明显的不同，是衡量出版人是高明还是平庸的最为重要的指标。纵观商务成功之路，从张元济到王云五，高于庸常的地方，就是强烈的转型意识。

张元济是对时代特点极其敏感的人，最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三点：

一是自学英文。他先前走的是读书做官的老路，相当顺利，23岁中举，26岁中进士，28岁任刑部主事。但是，他不是到此为止，在仕途顺畅时，已经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气质，即不安于现状，自觉进行知识更新，从1896年开始学习英文，广读新的书刊，且拜了专门的英文老师。其时，虽然风气渐开，但在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中，主动学习外语、研究西学者还是难得一见。张元济入值总理衙门后发现，在那么多章京中，仅他一人能识英文。

二是弃政从文。戊戌政变以后，张元济毅然弃政从文，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投放到教育与出版方面。日后他多次遇到重登仕途的机会，但要么旋进旋出，要么辞不就任，一直坚守于文化阵地。1913年袁世凯担任

大总统，张元济的科举同年熊希龄出组“名流内阁”，张謇任实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邀请张元济出任教育总长。张元济坚辞不就。

三是规避政争。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工作期间，原则上不出容易卷入政争的书籍。康有为在“辛亥”以后，是政争漩涡中人，先是反对民国，1913年他出版《不忍》杂志，宣传“虚君共和”，攻击民主共和制度，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被通缉。1918年通缉令取消后，他写信给张元济，想让商务代售《不忍》杂志和他攻击共和政治的《共和平议》一书。康、张私交原本不错，又都是戊戌维新的名角，但张从政治大局出发，对康的请求断然拒绝。1919年，孙中山想将所著《孙文学说》交商务出版。他此前是北洋政府通缉人物，这时通缉令虽然取消，但仍然是个极为敏感的政治人物。对于孙中山的要求，张元济与馆内同事思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不出。此外，对于政治敏感人物陈独秀的著作，对于他们办的刊物，商务也不肯承印。民国时期，政局动荡频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规避政争，从短时期看似似乎不辨是非，明哲保身，但从长时段看，恰恰是对政争本质的透彻了解，也是对转型时代政治特点的准确把握。

继张元济主持商务工作的王云五，更是一个对时代特点有深切感悟的人。他聪明过人，好学成性，知识渊博，自称“旧学没有考过科举，新学没有进过学校”，但其旧学、新学都达到了很高水准，让胡适都刮目相看、赞不绝口。他勇于创新，长于管理，主持馆务以后，借鉴国外出版社先进管理经验，建章立制，起用新人，使馆务大有起色。他策划的《万有文库》有1700多种，包括《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以及工学、农学、商学、算学、医学、体育、自然科学小丛书等，包罗万象，影响极大。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运思之巧妙，使用之便捷，堪称汉字检索史上的千古奇迹。他有句名言：“编著书籍当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也。”所谓“激动潮流”，就是对时代变化、社会转型有敏锐的觉解，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潮流的走向。

纵观清末民国商务几次大的商机，从新编教科书，出版严译、林译西书，整理中华古籍，到《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都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人对社会转型的准确把握有直接关系。

商务印书馆是近些年学术界比较热门的话题，国际、国内都有多部著作问世。有的侧重教科书编辑与出版，有的侧重古籍整理与研究，有的侧重企业管理与创新，有的侧重文化市场，有的侧重城市环境。董丽敏等所撰的这部大作，重点探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问题，是从文化理论角度切入的新作。

所谓现代性，按照金耀基先生的解释，是指现代文明体的性格和风貌。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普遍现象，落实到不同国家与地区，则因其地理、历史、文化特点不同而呈现鲜明的地方特性。世界各地现代化颇多相似，世界各地现代性则少有相同，理一而事殊，此之谓也。因此，讨论现代性，总离不开地方性。本书通过西书翻译、古籍整理、文学期刊、小学国文教科书四个方面，探讨商务印书馆所生产的近代知识，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影响。这四个方面，是商务印书馆业绩的主要板块，也是以往研究者重点论述的对象。本书的敏锐和独特之处，在于将这些方面置于近代中国所处国际大环境下讨论，置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定语境中分析。这样，就将商务诸方面贡献，从“事”的陈述上升到“理”的剖析，将企业的事功，放大为民族的应对。作者指出，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经历了从器物、政制再到文化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其蓝本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进程，在欧美发达国家，通常表现为一对矛盾运动，即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现代性与以公平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现代性的相摩相荡；而在中国，这种现代性追求，除了表现为西方那样惯常的矛盾运动，还包蕴了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有反抗，这样，既学习西方，又企图反抗甚至消解西方的两面性，注定了近代中国文化现代性在价值指向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正因为有此丰富性与复杂性，所以商务在展开翻译、古籍、杂志、教科书诸项事功过程中，以一种高远的眼光，既注意古今、中西、新旧之别，又努力打通古今、中西、新旧之间藩篱，纵览古今，涵摄中西，融通新旧，为当下与日后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分析，涵泳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征之以翔实的史料，很有解释力。

在我看来，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其实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对天下大势、时代变迁与中国传统有敏锐的觉解有关。追根溯源，他们坚持的那条路径，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重视当下、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有些事，远看似似乎轮廓清晰，身在其中反而界限模糊，有如韩愈所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所谓中西、新旧、古今，在近代许多人那里，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混沌一团。王国维有云：“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①再以资中筠先生的经历与感受为例。她说：

我当时所受的教育，以及整个的民国教育，并不存在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现在动不动就说“西化”怎么样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失传了怎么样。其实我们这一辈人，包括我们上一辈人，都不会觉得中西文化有绝对冲突。我从一年级进学校就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年级开始写文言文，在母亲的发蒙下从小读古书很多，《论语》

^①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就是母亲教授的。中学除了国文之外，还有经训课，就是四书五经选读，同时念英文，还朗诵美国的《独立宣言》，另外我们还有公民教育的课程。所以，我从小对于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思想有认同，这些都不会妨碍我同时接受传统道德和文化修养。现在一说西方的东西，都不得了了，洪水猛兽了，非得拿出孔子来镇一镇，这正说明我们整个价值观的断裂。^①

这在今人看来，很有些后现代的味道，但在秉持实践理性者那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也是我在上面特别申述张、王等人转型意识的用意所在。

董丽敏博士长期从事文学史、文化理论研究，在现当代女性文学、文学期刊研究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对洪深、茅盾、郑振铎、《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都有过专精的研究。所著《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洪深：激流中的呐喊》，在学界获得广泛好评。这次推出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是她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我以前做过一点张元济研究，对商务印书馆历史稍有涉猎，承她谬许，嘱我为序。我将书稿反复研读，受益良多，感到全书视野宏阔，思辨深邃，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征引规范而不烦琐，文字灵动而不华丽。最为可贵的一点是，作者有强烈的理论创新意识。全书以导论开场，阐释自己的理论系统，然后通过翻译、古籍、期刊与教科书四编展开论述，最后以结语概括全书要旨。这是一个从论旨、论据到论证逻辑都高度自洽的系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创新之作。作者对文学评论界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解构主义、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均谙熟于胸，但取精用弘，简约圆润，浑然天成，绝无生吞活剥之弊。

^① 资中筠：《不断逃离 回归自我》，《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关于商务印书馆的著作，尽管已经有了很多部，但是出自文化理论学者的这一部，与以往出自历史学者的那些相比，是很不相同的另一部，也可以说是另一类，是从学术体系、学术眼光、分析工具到学术用语都有诸多不同的另一类，是对于商务印书馆历史、近代出版史、中国现代化理论史研究都有独立贡献的优秀著作。相信读者阅后，自会颌首称是，不以我言为谬也。

特为此序。

塑造新型国民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序言

袁 进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要论起出版文化的变革，商务印书馆应该说是占据了极为重要的龙头地位。这家 19 世纪末方才问世的民营出版社，最初只有十来个工人，七八部印刷机，资本额只有 3000 多元；但是在进入 20 世纪之后，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社。不到 40 年的工夫，按照王云五的说法：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册数，在 1934 年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 45%，1935 年占 46%，1936 年占 52%，几乎占据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在中国的出版史上，民营的商务印书馆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这也是商务印书馆近年来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一个热点的原因。

在我看来，董丽敏等所撰写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说是众多商务印书馆研究著作中的佼佼者。其出色之处在于作者不是把目光聚焦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史上，而是把它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现代”转型的大文化历史背景下，以文学为中心，揭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互动关系。商务印书馆所创造的奇迹，不仅得益于这家出版社自身的成功经营，更缘于特定时代中空前的文化历史变迁所形成的巨大历史动荡，推动和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业绩。

19 世纪，人类在西方率先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资本主义化”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原有的传统型种族、国别都被打破了。原有的传统型

国家、种族、部落如果不能建立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民族国家”，调动自己全部民族资源，投入到“全球化”过程之中，就只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一般人很容易对“民族国家”产生误解，以为“民族国家”就是有民族以来建立的国家，这其实是望文生义。“民族国家”是“全球化”浪潮下的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全球化”“世界化”潮流中建立的与古代国家形态不同的现代国家形态。因此，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中国近现代“救国”最重要目标。这是一个充满危机感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仍然体现了这种危机感。

民营的商务印书馆正是在这一时代趁势崛起，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全球化”建立“民族国家”的需要，逼迫中国原有的“士农工商”型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建立与西方国家类似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传统宗法制的家族社会解体，走向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国民社会。随着王朝崩溃，官学衰败，中国文化从原有的士大夫垄断掌控，转为知识分子掌控，走向“国民教育”，普及到社会中下层。新型的道德意识、法制意识、科学知识的训练都成为新型“民族国家”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力图证明商务印书馆在适应和推动时代潮流的过程中的决策依据以及贡献，从而也展示出在这个动荡时代中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民营出版社非常出色的敏感性和包容性。

本书颇具眼光地选择了四个角度来描述商务印书馆与建立“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它的包容性：首先是开民智的西学翻译，它展示了商务印书馆全方位引进西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努力。在这方面既有对西方学者研究新学科的经典成果的翻译出版，更重要的，还有普及性的大规模百科全书式丛书《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其决策的着眼点主要在改变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以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培养新型国民。

其次是古籍整理。这是一个在塑造新型国民中常常为人忽视的方面，

过去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与建立“五四”新文学对立的。其实，文化为立国之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是国家的牢固基础，民族成员强大凝聚力的纽带。犹太民族失国两千多年后还能复国，凭借的正是其文化始终没有溃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华民族具有全世界最悠久而且没有中断过的历史文化，这是立国的根本。但是，面对“全球化”时代，不能再用中国固有的眼光去观照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而必须用全新的“全球化”眼光来重新梳理、定位，使之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基础，这就是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学者和留学生们，一面引进西学一面提倡“国学”的原因。这也是“五四”时期胡适在提倡“新文化运动”之后立即提出“整理国故”的原因。他们在对如何整理“国学”的具体定位和评价上尽管看法不同，但是对于建立“民族国家”需要建立新“国学”作为基础并无异议。商务印书馆正是在建立新国学为立国之本这一点上看得很准，它花费了巨大精力出版《四部丛刊》，校订补正《二十四史》，这些都是国学的根基。它所进行的古籍整理，一直到现在依然是我们古籍整理中的重要财富。

第三是文学期刊。商务印书馆是近代工业文明在印刷业的产物，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印刷机器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手工业作坊形态，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印刷的成本，促进了文化的普及。期刊作为一种新型媒体本身就是机器工业的产物，它取代中国传统线装书的同时也意味着文学的作者和读者都发生了重要的转换。在这文化发生重大变迁的急剧动荡时代，随着现代学科意识的加强、妇女地位的提高、儿童文学意识的出现，商务印书馆敏锐地逐步创办了相应的杂志，改变了传统文学/文化的格局。文学期刊的“多元化”显示了商务印书馆在这动荡时代中的敏感性和包容性。1920年代《小说世界》的问世，在新文学刚刚改组了《小说月报》之后，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保守派针对新文学的阴谋——茅盾当年正是这么看的。其实不然。新文学代表了时代潮流，但是喜欢旧文学的社会群体依然

存在，他们也需要属于他们的媒体，需要有人带领他们逐步向新文学/新文化靠拢。我们如果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可以发现，当年的鸳鸯蝴蝶派并不反对学习外国文学，也不反对白话文学的普及，他们也曾为建立民族国家做出重要贡献，他们与新文学的差别是改良与革命的差别。商务印书馆考虑到这一群体和市场的客观存在，另办《小说世界》，正是其包容性的体现。《申报》于1930年代改组“自由谈”专栏，原来的主编、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让位给新文学作家黎烈文；但是没有多久，《申报》便另外创办了一个副刊“春秋”，仍旧由周瘦鹃主编，也显示了这种包容性。这是由当时社会文化的客观环境造成的，商务印书馆能够占据广阔的出版市场与它的包容性显然是分不开的，这种多元化带来的包容性正是商务印书馆成功的原因之一。

最后是教科书。“教科书”概念进入中国，本身就是建立“民族国家”的产物。它的普及正是体现了为建立“民族国家”普及教育，塑造新型“国民”的需要。在中国人自编中小学教科书历程中，商务印书馆可以算是先驱者。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基础，是商务印书馆首先奠定的；后来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发展，是建立在商务印书馆所编教科书的基础之上的。商务印书馆也一直努力跟上时代的需要，带领着中国近现代教科书编撰不断向前发展。本书从教科书入手，通过发掘大量资料显示了商务印书馆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编撰教科书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积累了大量的财力，不断扩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当时其他大出版社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都是沿着商务印书馆开拓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中国近现代出版社的基本格局是由商务印书馆奠定的。

本书揭示了一个民营出版社在中国社会文化发生现代转换时所起的巨大作用。商务印书馆承担了新时代的需要，因缘际会，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空前的出版界奇迹。

本书主要作者董丽敏是一位非常用功的学者，曾经撰写过论述商务印

书馆《小说月报》的专著，写得非常扎实而且很有见解。她在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上已经花费了十余年时间，这次又带领研究团队推出新著，全面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在建立新文学 / 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显示了她的功力和在学术上的新进展。希望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推出更加优秀的学术著作。